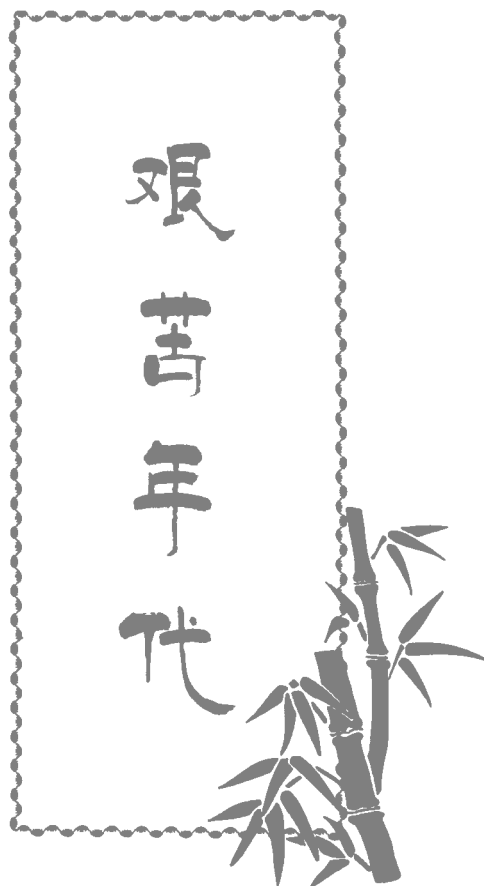




解放初筹粮支前的残酷斗争

司徒洪

1949年10月间，由陈赓、邓华将军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从赣分三路入粤，解放广东，沿途国民党军队不战而弃城逃跑，10月14日广州解放。粤赣湘边纵队亦由东江挺进珠三角，配合“两纵”解放中山。随后，解放大军马不停蹄，沿着西江两岸追歼残敌，进军广西，解放大西南。

中山在10月30日解放，11月初组织上动员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分配我去搞支前工作，任中山九区支前指挥所副主任兼安平乡粮筹工作队队长。当时支前工作十万火急，要供应数十万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的粮草，任务非轻。我服从组织安排，立即打起背包，带着由华南分局派来的同志，以及中山县青训班毕业学员共60多人，从三角（九区支前指挥所驻地）开赴安平乡乡府所在地——同兴。

安平乡是九区最大的一个乡，它地处珠江口，过去是国民党、大天二、土匪走私、抢劫、偷运粮食出香港

的必经通道。全乡约有禾田10万亩，均是肥沃的沙田，也是地主的大粮仓。全乡包括现在民众镇的陈十顷、田基沙、沙仔、鹤仔沙；番禺市的横沥镇；珠江农场的大澳沙、𩶛沙；还有南顺沙、塞口沙、沥心沙、缸瓦沙等。上级交给我们的支前任务是要筹800万斤粮食。

解放军“两纵”一团一连驻在乡府同兴炮楼，机炮连驻沥心沙，一个加强排驻陈十顷炮楼。华南分局派出广州军管会的肖仲钊、关振光、梁津等20多位同志，“两纵”派五名党员班长与我们中山40多位同志，组成强大的筹粮工作队；全乡分六个（同兴、陈十顷、冯马庙、义沙、沥心沙、九冲）筹粮分处。一连副指导员肖来同志任工作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加强党对筹粮工作的领导，确保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

我们进村后，当晚召开了有1000多群众参加的大会。在会上，我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讲明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是筹粮支前，支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我们筹粮的政策是按田亩分派，对象是地主，田亩多的地主多派，贫下中农不派任务。并号召广大群众支持我们完成支前任务。

我们正在开大会，国民党逃到万顷沙对面的龙穴岛

的炮艇向天打炮，火光映红了黑夜。炮声响后，安平乡大地主陈柱石的孙陈林走到我的背后，拿出左轮手枪指着我，准备开枪时，恰好解放军派来参加工作队的刘文锋同志带领大会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天，陈林被群众的呼声吓呆了，不敢开枪。又见一连解放军驻在同兴炮楼，离会场不远，他怕枪响后逃不了，于是便偷偷地离开了会场。

事后，当地群众对工作队李铁光同志说：“开会当晚我们捏了一把汗，以为会出事，结果陈林害怕你们，害怕解放军，他不敢开枪。

我们进村不久开始秋收，当年晚造收成不错，地坪上都堆满金灿灿的稻谷。物质基础有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去做工作，保证任务的完成。

但是，地主阶级则想尽千方百计来阻挠、破坏我们筹粮工作，甚至使用残酷手段来对付我们，杀害我们的解放军，他们的反扑行为比蛇蝎还毒，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报低产量、隐瞒田亩，企图蒙混过关。安平乡是新解放区，没有群众基础，地主以为我们全是非本

地人，不熟悉情况，便报低产量、装穷叫苦，又隐瞒田亩，企图蒙混过关。我们采取的对策是让工作队同志深入到各村，与群众搞好关系，消除他们的顾虑，在群众中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先从了解农民与地主租佃关系入手，查实地主们的粮食产量。因当地农民一向与地主采用“分耕制”，即每造收割稻谷后，即用 8:2 或 85:15 的比例分配收获，从农民中调查每户总收入，即可得出稻谷产量，地主们想报低产量的阴谋首先被我们击破。

其次，在查实地主拥有田亩方面，我们一进村就做上层工作，要原国民党安平乡乡长陈锦鏐交出他们乡府代国民党征收田赋的底册，里面有全乡地主向国民党田粮处交纳的田赋税记载，也登记了每户地主的田亩有多少；当然此册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有些地主也瞒报少了田亩，但基本情况是给我们掌握了，地主想隐瞒田亩也不成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他们又失败了。

（二）分散粮食，偷运粮食出口。我们当时和地主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粮食的争夺。他们瞒产隐瞒田亩的目的是企图不给粮食我们支前。他们在第一、二个回合失败以后，即用分散粮食方法来对付我们：（1）把收割回

来的禾把不脱粒，整把藏在禾草堆里，掩盖起来，等工作队走了他们才去取出来；（2）把粮食分散到农民家中，由农民帮他们分批运去大岗、潭洲、万顷沙等地出卖；（3）用大船偷运去香港和东莞万顷沙出卖和收藏起来。

我们工作队发动群众起来与地主作斗争，提出凡是查出地主偷运和分散粮食者，奖励所查粮食的10%。当时有一农民举报地主陈柱石在夜间分散3000斤稻谷到万顷沙一间米机收藏，我们到该米机查实确认后，就把全部粮食没收，奖励300斤粮食给举报人。于是群众纷纷起来举报和监督地主。

（三）利用关系，写条子放粮食出口。安平乡的“大天二”霍海泉原是“挺三”大队长，在抗战期间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解放初他利用当时郭××区长的关系，找其写条子给他放行粮食出口。有一次在冯马庙冲口，工作队发现一条大船装有三四万斤粮食出口，第一分处工作队长肖仲钊同志前去检查，知是霍海泉的粮食，见运粮食者持有九区政府盖章，并有郭××区长签名的放行条，感到奇怪，于是就打电话问我如何处理。我问他霍海泉完成借粮任务没有，肖查过后答未曾，我

叫他不能放行，扣住它用来抵顶任务，有多余的再让它出口。后来郭区长知道此事，在电话里批评我“目无领导”，乱扣押处理私人粮食。我当场对郭区长反映霍海泉未完成粮食任务，告诉他我有权处理，否则我就失职。后来县委副书记杨光同志到安平乡检查工作时，亦表示同意我们的做法。

（四）地主阶级捏造假象，联名控告我。 1949年12月底，安平乡大地主陈柱石、伪乡长陈锦鏊两人牵头，联合全乡地主、大天二、伪保、甲长等100多人签名向华南分局诬告我。他们捏造我在安平乡强迫“群众”借粮，任务过重，只写一张借条，盖筹粮办的章，无写明何日才归还，大批粮食不知运去何方等等。地主们称自己是“群众”，向华南分局领导诉苦。

他们控告的原因是我们筹粮工作队立场坚定，按当时支前政策办事。陈柱石是安平乡最大的地主，他在安平乡拥有5000多亩田地收租，在石岐有一间模范电影院，在大岗有一间大屋，在香港有商铺、有别墅，他拥有百万家财、三妻四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解放后我们接收了他在石岐的电影院，向他借粮数十万斤，触动了他利益，他当然非常不满，所以他就联名来控告

我

1950年1月，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批示派尚景波同志下来安平乡调查，尚景波拿出陈柱石、陈锦鏐等百多人签字的诬告书给我看，要我实事求是地一一回答，把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我说：这是地主搞鬼，狗急跳墙，无中生有诬告我。我拿出全乡地主交纳国民收田赋的材料，证明他们不是“贫民群众”，我们是按占有田亩去下达任务的。关于粮食去路，我把中山县支前指挥部的收据拿来，证明粮食已运去支前。至于借粮收条是我们发的，但何时要归还，我们却不知道，此事由上级来决定。尚景波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我们支前工作有成绩，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完成任务。他表示回去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叫我不用担心。

（五）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不改，他们放出声气要杀害工作队×××同志。他们曾经提出：如果谁杀了工作队×××，就奖励稻谷10万斤。九冲积极分子郭××（女）听到此消息后，叫我们要提防敌人下毒手，晚上少出街，平时千万不要单独一人行动。后来我召开了工作队全体同志会议，要大家提高警惕，并叫大家不要害怕，地主阶级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六）地主提供武器，勾结伶仃岛残匪，组织武装暴乱，杀害我解放军。1950年2月16日（除夕）下午7时，由地主陈华胜、梁锦全，大天二吴兆华、郭明生等供给枪枝，以陈满根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由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守在伶仃岛的匪首汤炎光幕后策划，于陈十顷聚集100多名匪徒进行武装暴乱，打死我5名解放军同志。当晚陈十顷筹粮分处10多名工作人员在石岐参加中山县第一届干部会议，免于罹难。

（七）派员假装积极，混入革命队伍，作长期潜伏，等候时机反攻。他们知道“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的道理，在国民党全面败退时则安下了定时炸弹。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部向珠江口败退时，于安平乡冯马庙遗留下一大批武器给当地“民利”中队长谭秉恒，谭在逃亡澳门前，将那批武器交与其弟谭满收藏，解放后谭满曾到澳门去探望其兄谭秉恒，谭秉恒叫他不要把枪交出来，留作“反攻大陆”之用。谭满回来后，则假装积极，帮助筹粮工作队计数不要报酬。而且还深得工作队同志的信任，与他同食、同住、同工作，提高了他的威望。后来被群众选为冯马庙第一任农会主席兼文书，掌握农会大权。直到自新人员

举报，才把他挖了出来，把收藏的枪枝起出来，计有轻机一挺、冲锋枪4支、卡宾两枝、七九步枪10多枝，以及子弹一大批。1952年由司法机关判处他死刑。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能思想麻痹，要警惕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通过这场历时一年多的支前筹粮斗争，我们全体工作队同志增长了斗争的经验，深刻认识了地主阶级的本质。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我们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99年12月整理

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

何志伟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珠江纵队五桂山部队挺进中山九区组建的主力部队之一的“纪光队”（中队，领导人司徒洪同志，1949年10月编入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队员。我曾任纪光队的第一班长，并于1949年10月下旬配合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三团解放大岗镇，截击残余匪军，后转回陈十顷活捉反动地主吴兆华，并缴获其轻机枪、卡宾枪、快制驳壳枪、左轮枪等武器一批，人及武器全部移交给边纵部队处理。1949年10月30日，纪光队奉命回师与纪民队及边纵一团兄弟部队约一个连会师解放黄圃镇。

1949年5月，珠江纵队五桂山根据地黄旭特派员（县委书记中山独立团政委）派遣杨信、冯洪泽两位同志到中山九区，接受中共中山县委执委九区区委书记、武装委员会主任——梁泰猷的领导，梁任命杨信为潭洲、大岗武工队队长，冯洪泽为副队长，带领五桂山派回九区的干部战士吴日全（战斗英雄）、何培机（枪手）、苏

绍、吴惠全等同志，在当地组织发展武装力量，以革命武装为后盾，进行抗“三征”（反抗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拥有武工队武装力量五、六十人枪，拥有轻机枪、卡宾枪各一挺，手枪五十多枝。1949年9月，杨信奉命带领部分武装到孖沙、北帝庙集结，参与组建三个主力队“纪雄队”、“纪文队”、“纪光队”。冯洪泽奉命率领留守潭洲的三、四十人枪配合大军解放潭洲，握守潭洲水道，截击潜逃残敌，维持当地治安，防止敌人垂死挣扎、破坏等。后来杨信带领黄圃区中队配合两广纵队剿匪战斗，曾组织潭洲武装会同驻大岗的两广纵队第五连，围剿潭洲中阜林辉兄弟的反共救国军。缴获其武器及捕获林辉等敌人。至1950年初，梁泰猷派杨信回潭洲成立潭洲人民工作委员会，杨信当主任，黎赤、冯世欢为副主任。1950年5、6月间杨信主持召开各村代表及工人商人等代表参加的“潭洲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潭洲人民提出的建设工作决议：一、修建人民大会堂（后建好，前年因危楼拆了）；二、修建潭洲镇街市，建好放马村的木结构大桥；三、扩宽通往大岗的道路（以上二、三两项当时尚未完成）。不幸的是1950年7月间，杨

信同志因冤假错案，被错误处理调离潭洲（现已彻底平反了，享受离休处级老干部待遇），九区区委书记即派李泽桐同志接任潭洲工作委员会主任，仅十天左右，后因工作需要，我由十区调回九区，再由区委书记派去接任潭洲人民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并任民兵中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我当时的任务是开展建政、培养地方干部、清匪反霸、肃特务工作，任务十分重大。要建立政权必须通过斗争，因为潭洲反动党、团总部设在潭洲，土匪恶霸大天二众多，敌情十分严重，而且我们共产党人曾在潭洲长期斗争，所以敌人必然隐蔽得很深。我是在梁泰猷、肖权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首先组织进步男女青年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了解敌情。开诉苦大会，激发群众觉悟。在诉苦会上把混入基层的黄敬忠当即缴械扣押（处决），并向群众表明态度：共产党坚决为人民，大家不要怕。当时是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期，敌特嚣张、谣言甚多，群众有怕变天思想。上级指示来一次政治攻势，临时关押一批反革命分子。明确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大功受奖。迫使敌人交出武器长、短枪一大批（约30支），缴获13米重机枪一挺、子弹一箱，巧捕反革命分子董黑多（已处决）。我和黎赤同志

带领两位民兵去龙古村抓捕反共救国军副中队长郭保林。不见郭在家，只见后门打开，我便到后门一看究竟，只见水埠头处有一个白色布袋之袋角露出水面，一块红砖压在布袋上，还有水泡浮出水面，拿起一看原来有反共救国军的胸章、臂章一大批，砒霜毒药一包（约有七、八两重），委任状一张（尚未全湿），按情况分析，此人走了不久。我们立即到其结发妻处追捕，其结发妻住顺德罗五沙。不出所料，郭保林在罗五沙返潭洲途中与我们相遇。当时其妾突然在我们身后出现，动手夺我同志的武器，我同志就一脚踢她下田。郭即令其妾住手，我们动身押着郭保林返潭洲。接着又出现新的情况，有六七人持枪飞步而来欲抢人。我和黎赤埋伏在禾秆堆处作掩护。那些人见地形对他们不利便自动后退。反共救国军正队长雷振中已在容奇被捕，大长了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这样一来，安定了民心，顺利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选举结果，黎赤为正乡长，袁柏林为副乡长，这才使潭洲人民得到彻底解放。

从围剿变救援 ——记解放初一次剿匪的意外收获

司徒洪

1949年底中山刚解放不久，各地治安情况欠佳，国民党遗留的土匪、特务，四处搞破坏活动，在原九区安平乡的田基沙、沙仔、沥心沙一带，仍有匪徒进行抢劫、打家劫舍、走私等活动。群众对此非常痛恨，要求解放军和工作队对匪患进行打击，确保社会安宁、人民生活财产安全。

我们安平乡支前工作队，根据群众的举报，马上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匪特进行清剿，决定先围剿田基沙头围，那里无人居住，是匪首陈满根、梁添友、冼全仔等经常出入、聚集作案犯罪的地盘。

参加那次围剿行动的有两广纵队一团派来的解放军韦明佳、刘文铎、陈金玉、陈铿章、黄锋等班、排骨干；有广州市军管会同志梁津、崔月梅、肖仲钊、关振光等；我们中山有刘文业、欧炎良、冯色本、杨汉棋、周文鉴、冯润、当地老农吴满等共20多人。

会上指定由刘文铎、陈金玉两位解放军指挥。携有轻机枪一挺，长短枪20多枝，一天早上乘两只小艇，分东西两路进剿。我跟东路，由文铎同志指挥；陈金玉同志带领的西路，从后面跟上。我们从陈十顷工作队队部出发，直扑头围上岸。在基围内转角处，有一间小茅草屋，我们怀疑是土匪藏身之处，便提高警惕，将子弹上膛，搜索前进。我们走到离茅屋约50米时，听到屋内有铁链声，刘文铎上前数步，大声叫喊：“茅房内有人吗？”但许久却未听见回答。刘文铎同志再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放下武器，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但对方仍无动静，令我们深感不明；冯润同志跟着喊：“你们顽抗不出来投降，我们就开枪了。”多次的叫喊，对方仍无反应，真是奇怪万分。刘文铎同志再喊：“如果你们不投降，我真的开枪了。”茅房内仍然鸦雀无声。刘文铎同志架起机枪向屋顶上“扞”、“扞”、“扞”……扫射了一轮，打得茅屋顶禾草四面乱飞，但屋内还是寂静无声。刘文铎同志继续向茅房开枪，打落了一大片禾草，但仍不见有人出来。

陈金玉听到枪声，带队走了过来，他叫我们不要再

开枪，他从旁边观察了一会，自己冲入茅房内，大叫“投降不杀”，他拉开屋内禾杆堆，发现有一老头子倒在屋角地下近基边处，陈金玉同志以为给我们打死了，用脚去踢了他一下，那老头动一动身转过来，大叫：“老总不要杀我，我不是坏人。”

他颈上锁着一条大铁链，铁链另一头绑在地下的木桩上，我走上前去问他：“你是什么人？家在哪里？为何被人锁在这里？”

他说：“我是顺德陈村人，是一个良民，在陈村开有谷米店一间，一个多月前被人劫到这里，要我出10万元港币才放我。他们叫我写信让家人送钱来，可至今没有回复。”

我听了他的话，知道这是一宗标“参”勒赎案，可能遇上中山、顺德刚解放，他家人恐途中发生意外，不敢带这么多现金来赎人，所以拖了这么久时间匪徒都不放人。我们这次剿匪虽然扑了个空，但却救出了一名粮商，总算也有意外收获。

我们用刺刀斩断地下木桩，将他解救出来后，护送他到三角九区支前指挥所，他颈上的铁链仍未解开，刚好原九区区委书记兼支前指挥所主任梁泰猷同志在那